

猫头鹰学术文丛

黄开发 著

人在旅途

——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



人民文学出版社

100758

猫头鹰学术文丛

I 206.6
9

人在旅途

——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

黄开发 著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黄开发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7

(猫头鹰学术文丛)

ISBN 7-02-002828-4

I. 人… II. 黄… III. 周作人-文学研究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3379 号

责任编辑:一 土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02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625 插页 3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7.00 元

学术顾问

王乾坤 王富仁 邓晓芒
周国平 耿云志 钱理群
黄克剑 葛剑雄

策 划

王培元 高贤均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黄开发，1963年12月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叶集镇。1986年获安徽师大文学学士学位。1989年获北京师大文学硕士学位。后任教于北京教育学院，1996年被评为副教授。1997年考入北京师大中文系，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已发表当代文学论文二十余篇。

致 读 者

有一种猛禽，古时名“枭”，俗称“猫头鹰”。它习性古怪：黑夜活动，白昼栖息；即便睡去，也睁着一只眼。这独特的生活方式，使它拥有了与众不同的目光和视野。猫头鹰飞翔时悄无声息，偶尔发出一两声怪叫，难免令世人惊悚。

在希腊神话中，它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代表；在黑格尔的词典里，它是哲思的别名。而在鲁迅的生命世界中，它更是人格意志的指称。鲁迅一生都在寻找中国的猫头鹰。他虽不擅丹青，却描画过猫头鹰的图案。我们选取其中的一幅，作为丛书的标志。

我们渴慕智慧，我们企求新声。这便是“猫头鹰学术文丛”的由来。

编 者

一九九八年九月

序

钱理群

黄开发先生第一次与我见面，就要我为他的第一本周作人研究专著作序，我欣然同意了。这是他所不知道的：在我的内心深处，早已与他结下了一番“情缘”，或者说，早就感到欠了他一笔人情债，现在正是一个偿还的机会。我至今也还清楚地记得，是那样一个时刻，我的（以及几乎所有的同行的）周作人研究，突然成了一种显示了某种有害倾向的“罪证”，而且是不容声辩的。——坦白地说，遇到这种阵势，我也不愿辩解，因为鲁迅早就说过，“无论是谁，只要站在‘辩诬’的地位的，无论辩白与否，都已经是屈辱”。正在我（我们）承受着巨大压力，而又不能（也不愿）说话的时候，一个年轻人，一个刚刚涉足周作人研究的大学生（硕士研究生？）发言了，他就是黄开发。当我读到他的《周作人研究述评》（大概是收入本书的同题文章中的第二部分），以及他的另一篇与某位“权威批评家”论辩的文章时，真的为他的不畏权势、仗义直言的学术正气与勇气，为他的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几乎是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记住了这

个名字——不仅是他对身处逆境的我的支持，更因为我从中看到了周作人研究的希望。以后我就一直默默地关注着这位有了很好的起点的年轻学人，读着我所能看到的他陆续发表的文字，为他的学术上的每一个进展感到由衷的高兴，也为他的某些挫折（例如他编的一本书被无端地删改，他的序言也受到了粗暴的干涉）愤愤不平，同时也为周作人研究的举步维艰而陷入深深的困惑。——我早就有许多话要说，这篇“序言”是不经约请也要写的啊。

我还是从作者新写的《周作人研究述评》最后一部分的有关评述说起。这是这些年一直在进行的论战：据作者介绍，论战的一方认为，“周作人嘛，首先第一他是一个汉奸。……这不仅是政治定性，也是人格定性，……也是文格的定性，其他的这样那样都得靠边站”，“他留给我们的，主要是历史的鉴戒。正确评价这个历史人物，就必须抓住这个大节，推源其失节的因由，以垂训后世”；论战的另一方则认为，“周作人的一生，也主要是一个文学家思想家，同样应该主要以文学的思想的标准来衡量。他在文学上思想上的成就太大，我们不应该用一顶‘汉奸文学’的帽子一笔抹煞，那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我们继承这一份不该拒绝的遗产。至于他叛国附敌，这是政治行为，对此当然要用政治标准，无须曲为之讳，更不能像前几年有人造出新奇之说来为他翻这一案”。本书作者则作了如下评价：“儒家伦理道德往往把个人的道德节操看作衡量一个人价值的绝对标准，在文学批评上往往出现因人废文的现象。在西方，海德格尔、庞德……他们的（投靠法西斯）的政治行为都曾受到惩罚，然而这些似乎并不妨碍人们去理解海德格尔博

大精深的哲学思想，欣赏庞德卓越的诗艺，也没有听说有谁怀疑他们的大哲学家、大诗人的身份；可是我们的不少人偏偏要把孩子和污水一起泼掉。”——这确实是一个关系着周作人研究的全局的大问题，是每一个周作人研究者都不能回避的、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也想借这篇序来谈谈我的基本想法。

回顾本世纪，一个事实是绝对不能回避的：我们曾经作过“异族的奴隶”，也作过“自己（本民族统治者）的奴隶”。这都同样不容否认与美化：既不能如鲁迅当年所说，因“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而得出“到底还不如作自己的奴隶好”的结论；当然也不能因憎恶本国的奴隶统治而有意无意地淡化“异族奴隶之苦”。还有一个事实也必须正视：在沦为（异族的与本民族的）奴隶时，我们自己（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总是有某些人不同程度上充当了奴隶统治的推波助澜者、为虎作伥者，他们是奴才，而不仅仅是甘于自己作奴隶而已；因此，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奴隶制的罪恶统治是有他应负的那一份历史责任的。我曾经多次说过：“一切对历史血腥气的消解（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应该受到诅咒”（见拙作《精神界战士的大悲剧》）；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立场，或者说是一条基本的不能跨过、不容让步的“线”：对一切形式的奴隶统治（不论是异族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以及任何旗号下的出卖民族（与个人）尊严与自由的“奴才”行为，都应该受到谴责，而不能有任何的原宥（更不用说美化）。以这样的基本立场，来看周作人的事敌——充当日伪政府的高级官员，并实际参与了“治安强化运动”与“奴化教育”，为异族奴隶统治效力，这样的历史事实不容否定，其历史的罪责也是不能推卸

的。问题是，在肯定了这样的“大是大非”的大前提以后，周作人的“事敌”，还有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即他为什么会事敌？是思想、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什么动因，是怎样的思想逻辑使他落入陷阱？特别是作为一个曾经是民族优秀知识分子的周作人的失足，包含了怎样的思想、文化，以至理论上的教训？……这些都是需要经过对具体历史事实的细致考察，深入的理论分析，才能得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结论的。但在一些人看来，对周作人的事敌，只能作政治与道义的谴责，而不能作这样的思想、文化上的分析，一旦作了，至少在客观上就构成了对周作人事敌的辩护。也有的把周作人的事敌简化为一个政治问题，似乎只需要在政治上有一个基本判断与态度，而无须作学术上的深入研讨。在对周作人事敌原因（逻辑）进行深入研究与揭示时，我们所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周作人个人，而很可能是我们整个传统文化，以及现代文化，以至当今（以至未来）知识分子的选择、人格自塑，人类生存的一些基本矛盾、困惑，以至危机，因而是有极大的理论含量与前景的，而且也是有不可低估的实践意义的。我同意一位朋友的说法，“周作人是一面镜子，在社会动荡的岁月里，他尤其具有一种警觉的价值。中国知识分子倘不解决周作人似的矛盾，要建立新型的人格，大概是困难的”。（孙郁《鲁迅与周作人》）它因此具有极大的理论难度，并且处处充满陷阱，需要更大的理论勇气与学识，而其学术的吸引力也恰恰在于此。正因为充满陷阱，在探讨过程中，出现不同的意见，以至产生这样、那样的失误，都是有可能的，并且是正常的；可以（而且必须）展开学术的争论（批评与自我批评），但绝不能将讨论中的不同

意见，哪怕是失误，简单地归之为“为周作人投敌行为的辩护”。面临的问题越是复杂，就越需要学术的民主与自由：周作人研究能否深入、健康的发展，实赖于此。

但周作人研究又确实不能局限于周作人事敌这一个问题上。我们已经肯定，周作人的事敌，是一个政治上的污点，并且也谈到了政治上的失足，与他的思想、文化观念可能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但是，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态度、活动与他的思想、文化（文学）、学术立场、观点、活动，同时又是可以、而且必须区别开来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对胡适的评价与研究：“作为政治家的胡适与作为文化名人的胡适，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种客观存在的联系，在我们的研究中是不能回避的；但两者的区别与差异也是明显的。在我看来，胡适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与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是很不同的，在价值评价上会出现较大的差异。”（《漫说“现代文化名人研究”》）对周作人的研究也是如此：不能因为对作为伪官吏的周作人的理所当然的全盘否定，而简单地推导至对他在思想、文化、文学上的成就与地位的否定与贬抑。甚至对周作人任伪职时期的文学创作、学术活动也要作具体的分析，不可一概否定的。对后者的评价，是需要对他在思想、文化、学术上的实际贡献，经过科学的研究而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在研讨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但我们绝不能因为有些学者对周作人的文学、学术成就评价较高，就简单地认为是在“为汉奸涂脂抹粉”；同样也不能以不加研究、分析地贬低周作人在文学、学术上的贡献，来显示自己政治立场的坚定。也就是说，如何科学地评价周作人在现代思想文化史与文

学史上的成就与地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因此，不能以政治的义愤与评价来代替学术的评价，而学术的评价又是需要通过认真的研究与平等的讨论，不是给对方戴几顶政治帽子就能解决问题的。这些，在其他学术领域，早已成了常识；但在周作人研究这里，却成了必须认真辨正的问题。——我在这里说着，都感到透骨的悲凉。

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我是基本上同意本书作者的意见的：对于周作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评价太高，而是估计不足；不是研究“过热”，而是有许多研究的空白或薄弱点，还存在着许多误读与曲解，在追求周作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里仅就作者提出的两个重要观点，稍作一点发挥。本书在好几处都强调周作人作为“思想家”在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概括。作者引述了王富仁的观点：“不（能）把思想家仅仅按照西方的模式理解为一种完整的理论学说的营造者，而（应）理解为实际推动了一个民族并由这个民族及于全人类的思想精神发展，丰富了人们对自我和对宇宙人生的认识的人”，我以为这一“思想家”的标准是可以成立的。周作人所建立的“人学思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及以后的发展的影响，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的现代启蒙思想家的重要代表。不可否认，40年代周作人的事故使他失去了（至少是在相当范围与相当时间内）思想影响力；但在此之前，他却一直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主义作家）的精神领袖之一，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还必须看到（与充分估计）周作人某些思想的超前性：这些思想在他所生活的大动荡的时代里，可能不合时宜，甚至

在实践中可能是有害的；但在另一个时代环境中却完全可能呈现出新的价值与意义。因此，周作人不仅在本世纪中国人（特别是相当部分知识分子）精神发展史上打上了自己的思想印记，而且他的思想中还包含有许多通向未来新世纪的因素。应该说，具有这样的双重价值的思想家并不多见，是弥足珍贵的。周作人的思想遗产，不仅是他个人的，而且也是一个世纪全民族（以至全人类）精神发展的结晶；尽管具体创造者是这样一位曾给民族带来损害的一度失足者，会使我们在接受这份遗产时，在情感上产生某种障碍，但如果因此而拒绝接受，那我们就陷入了更大的愚昧。思想家的匮乏，原是本世纪的最大缺憾之一；如果再人为地任加砍伐，那就更加可悲了。

周作人的文体家的价值，大概是容易被承认与接受的。但也因此产生了许多同样可悲的误读。这些年在对其作品的商业炒作中，周作人在普通读者心目中，成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避世者，一个享乐主义者（美食家等等），一个传统的士大夫遗老，他的散文也被简化为“第一是闲适，第二是闲适，第三还是闲适”。对周作人其人其文的某一侧面主观、片面的任意夸大，使其内在的矛盾与丰富性全都没有了，其真实的面目也被掩饰与曲解了。这样的商业性的变形，是周作人的厄运，也是现代作家、学者的厄运，并且在劫难逃。在这样的阅读（接受）情境下，严肃的学者的认真的学术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至少可以起一点“抗拒曲解”的作用。在这方面，黄开发的这本书，有很多“还其本相”的学术发现。单就他提出周作人的“审美理想和艺术风格是在平淡和不能平淡，或者说在正经和闲适之间，保持艺术的张力，其根本的艺术法则就是

节制”（见第五章《小品散文的文体》），就足以纠正将周作人的散文风格简化为“闲适”一语的偏颇了。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小品散文的文体特点与其人生哲学的契合”，一再指出，“小品文是周作人找到的一个对世界的发言方式，一种存在方式”，并且从“生活方式与心境对作家话语选择（创造）的作用”这一点切入，将周作人的散文语体分为“情志体”、“抄书体”与“笔记体”，从作家“生活方式”、“主观心境”与“语体”的三者统一中勾勒了周作人文体发展史。而全书更是从“思想家与文体家的统一”中去把握周作人，这样的研究思路，不仅使作者的周作人研究取得了内在的统一，显示出自己的研究个性，而且在研究的方法论上能够给后来的研究者以启示。这也是本书作者对周作人研究的贡献吧。

本书的具体贡献还很多，例如作者关于周作人完成于40年代初的对儒家的重新阐释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与马克思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不同的思路”，这在周作人研究，以至现代思想史研究上都有一定的意义。作者对周作人书信的研究，对“遇刺事件的始末”的调查与考证，发表时即为学术界所注目，收入本书，大概也会引起读者的兴趣。

我最后要说的是，与周作人研究的今后发展有关的两个问题。本书作者在展望未来的研究时指出，在确认周作人的“思想家与文体家”的地位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具体地揭示与分析“他提出的思想命题，他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等等”。这确是一个难题，本书作者作了初步的尝试：他在研究周作人文体（独特的表述方式）时，注意到“‘趣味’是周作人论文时频繁使用的一个词”，并以为“趣味”在周作人表述

体系里“带有‘准理论’的性质”；在论及周作人的“人本主义”思想时，也注意与强调了“常识”这一周作人的基本概念。应该说，作者的这一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思路与我的思路颇为相近，也可以说是“所见略同”。我在从事鲁迅研究时，曾提出“从单位观念（意象）入手，进行多层次（哲学的、心理学的、伦理学的、历史学、美学的）开掘，或许是人们进入作家思想、艺术殿堂的有效途径”。后来我在为浙江文艺出版社编的《周作人散文精编》“序”里，又具体地提出了“爱智者”与“常识”，“东洋人的悲哀”（“凡人的悲哀”）等单位概念，以及“风”、“雨”、“水”等基本意象（拙文《别一种文学——周作人散文论》，收《精神的炼狱》）。我现在想，可能还有“重来”这一类的基本观念（命题）。如何全面地梳理出周作人的基本概念（观念，意象），并准确地揭示其丰富的、多层面的内涵，从而建立起周作人所独有的思想、文学体系，这可能是今后周作人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的学术工程，本书作者开了一个头，我们应该继续作下去。

作者最后提出的周作人著译的收集、整理与出版的问题，更引起我强烈的共鸣。早在几年前，我即与几位朋友筹划着集中全国周作人研究的力量，编辑出一套完备的《周作人全集》（包括译文），我还起草了一个详尽的编辑计划。尽管此事终成泡影，我仍不死心，时不时将压在抽屉底的计划书翻出来，抚摸一番。这回读到作者文末的呼吁，又引发出我的遐想：如果……如果在这世纪末（或下一世纪初），在我退休之前，能够 and 全国同行一起，编出（或开始编）《周作人全集》，把这“世纪中国文化遗产”贡献给下一世纪的新人，那该是何等地富有

“诗意”！那么，我，开发，还有所有为周作人研究吃够了苦头的
朋友，又有了一次“同冒傻气”的机会，那将是多么的“有
趣”（这正是周作人的概念）啊！……

1997年10月3日写毕于燕北园

目录

第一辑

-
- 一 “人学”思想与人生哲学、文化选择…………… (1)
 - 二 双重的悲观与他的附逆…………… (42)
 - 三 文艺思想的考察…………… (66)
 - 四 民俗学方面的工作…………… (93)
 - 五 小品散文的文体…………… (101)
 - 六 知堂书信…………… (149)
-

第二辑

-
- 七 遇刺事件始末…………… (171)
 - 八 关于周作人的附逆及其它…………… (187)
 - 九 需要一种学术态度…………… (194)
 - 就周作人研究问题答曾镇南先生
 - 十 近八十年来的周作人研究…………… (205)
 - 1919—1949…………… (205)
 - 1980—1989…………… (234)
 - 1990—1997…………… (256)
-

后记…………… (289)
